

#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李伟丽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华传教的结果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间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俄国东正教团在发展教徒方面没有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贡献只限于汉学研究。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关键词:** 俄罗斯东正教团;天主教;传教士;清代前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44(2005)01—0001—03

本文不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归入西方传教士,而是将它与早期耶稣会士(天主教)、后来的基督新教等西方传教士区别开来,是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里的差异并非作为基督教的不同教派之间的差异,而是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模,以及结果等方面的不同。

## 一、途径不一,目的相异

东正教传入中国有两个渠道,1684、1685年雅克萨之战中俘获的部分俄籍军士被送至北京,编入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这批俄籍人中包括东正教徒,康熙帝尊重他们的信仰,下令赐予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庙宇,允其宗教生活,此即“北馆”,当时的阿尔巴津人称为“圣索非亚教堂”。因此,最初来华的东正教教徒并非带有大规模传教之目的。东正教传入的第二个渠道是沙俄政府受允于清政府之后,于1715年向中国派遣的东正教团。在中俄双方了解甚少的情况下,除了保证驻华东正教徒的宗教生活,“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黑暗中的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的人们皈依正教”,<sup>[1](P50)</sup>彼得一世派遣东正教团还有其他的目的,即“使俄国政府了解中国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sup>[2](P101)</sup>及至19世纪初,俄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交流,1818年8月8日对驻华东正教团作出新的指示:保持并增加教民人数;学习汉语和满语;向俄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搜集书籍、地图、种子,尤其是能够在俄国种植的植物种子、植物、矿产等。<sup>[3](P481)</sup>自此东正教团的主要任务由宗教活动转变为进行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研究,并且负有将

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报告外交部的责任。

而1541年来华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是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的。1581年耶稣会又派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到澳门学习中文,准备进入内地传教。他们的使命主要是从事“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sup>[4](P521-522)</sup>即以天主教教化中国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的艾儒略早在他1603年写给会长一封信中,要求被派遣去传教:“出于对耶稣的爱,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愿意忍受任何的苦楚。我不仅要奉献我的生命,而且要切实地运用我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为上主的宝血救赎的不幸灵魂。我希望协助基督,拯救那些灵魂,因为在这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他们缺乏任何的灵性帮助。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主已给我火一般的渴望为他的爱而工作。”<sup>[5](P38)</sup>在16世纪汹涌的传教浪潮中,传教士的热情可见一斑。

## 二、文化素养反差巨大,布道方式面貌迥异

在华各国传教士在文化教育素养上也存在着很大反差。产生于16世纪的耶稣会学校拥有近代先进的教育体制,学生在这里必须首先经过几年的时间学习诗学、修辞学、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数学等课程,然后才能开始神学的学习。依次来华的范礼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等都毕业于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耶稣会创始人)于1551年创建的罗马学院。

在向各地的传教事业中,依纳爵·罗耀拉相信运用非基督教经典的合理性,相信这是探讨文化适应性的重要途径。沙勿略也意识到,为了达到在中国

收稿日期: 2004—10—18

作者简介: 李伟丽(1974-),女,河南省清丰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2002级博士研究生。

传教的目的,必须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但是他没有能够进入广东,客死上川岛。

范礼安是继沙忽略之后的第二位来华的优秀基督教传教士,他的历史功绩是实践了沙忽略所追求的本土化方法和在中国开始传教的设想。

罗明坚于1579年抵达澳门后一直协助范礼安的工作。他学习汉语,并与广东省的一些官员结交。1584年罗明坚写了第一本中文要理问答——《天主教实录》。罗明坚用他最为著名的一句话表明他的适应精神:为了使中国人臣服在基督的脚下,我们的表现就得像中国人。<sup>[5](P48)</sup>

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1583年居住肇庆后开始设法融入当地社会。此后,在广东韶州、江西南昌他更是以“西儒”自居,着儒服、戴儒冠,结交儒士、官员、皇族,谈论天文、地理、哲学,以儒传教成为他的首要手段。1595年他在南昌出版了天主教护教文献《天主实义》,该书即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基督教义。经过多年努力的利玛窦来到北京之后,向明神宗呈献圣像、自鸣钟、西洋琴等物,这位中国打扮的“远夷”及其“奇器”果然引起万历皇帝的兴趣,结果获准留居北京。此后利玛窦便在北京开堂传教,天主教开始在中国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

而以上这些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所没有做到的。如前所述,俄国东正教徒并不是为了传教而主动来华,他们是两国战争的俘虏,并未计划在中国人中间做太多的传教工作,所以并无方式与手段可言。

尽管如此,为了布道团能够在中国生存,俄国政府对布道团成员们在华的行为方式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1780年,第七届东正教团赴华之际,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该届团长、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工作指示中要求他们“一到中国就要努力会使用他们的语言,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就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向他们传授福音真理”;<sup>[6](P90)</sup>并且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做出具体细致的要求。<sup>[6](P93)</sup>但是这些东正教徒并不像耶稣会士那样用心学习中国语言,很多人在京居住多年仍不熟谙中国语言。在此之前的每届东正教团里都有不但不虔信自己宗教的人,而且有不尊敬上司、酗酒、打架斗殴的人。康熙皇帝时期,关于俄国人动手杀害中国人,中国官员上奏时,皇帝只得谕旨中国人要尽可能地回避俄国人。<sup>[6](P27)</sup>由此可见早期东正教团成员的文化素质与欧洲传教士的反差。《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的编纂者维谢罗夫斯基有一句较为恰当的论断,他认为第四届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关于前四届成员阴暗面的记述,“与其说是给这一机构罩上一层阴影,还不如说是对很久以前那段时期作了一个鉴定:当时外来文明的漂亮外衣仍然掩盖不住我们祖先尚未开化的粗野性格”。<sup>[6](P13)</sup>

### 三、受制于文化素养的不同活动范围

耶稣会士用心于同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联系,注意在活动范围、规模上的拓展。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被称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也由此而信奉了天主教<sup>①</sup>,其他明代名士信教的还有十余人。他们对传播天主教和传播西学起了很大作用。利玛窦在南昌时结交了白庙书院山长章潢等极有身份的人物,接待了大批来访者,传授天文、数学和记忆术等方面的知识,撰写了《天主实义》、《西国记法》和《交友论》等,由中国朋友刊印,广泛流传,成功地在士大夫中间赢得了声望。离开南昌之时,他认识的朋友已及于当时15省中的10省。

最初来到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境遇却非如此。清廷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赏给他们为妻,这些中国妻子“不仅教他们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还向他们灌输自己的宗教信仰”,于是这些阿尔巴津人就不再与他们的司祭往来,更不去教堂做礼拜。<sup>[6](P28)</sup>18世纪80年代,阿尔巴津人完全忘记了俄语,只有教名,除此之外,他们不仅在风俗习惯上,而且在礼节方面都已经被中国人所同化。而接受领洗的中国人并非真诚皈依东正教,只是因为“可以比较方便地同俄国人做生意”,所以在俄国商队离开北京后,“在教堂里任何时候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sup>[6](P73)</sup>

### 四、各教派自身特点的影响

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一支,与天主教、新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宗教权利经常强烈地干预世俗政权,二者之间的斗争和冲突时有发生。

东正教自拜占庭时期就表现出它不同于天主教的特点:教会为国家的命运负责。18世纪初彼得大帝进行改革,于1721年废除了牧首制,成立了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其首脑由沙皇直接任命。自此,俄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权利表现出对世俗政权的服从。1860年之前的俄国驻华布道团几乎自始至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政府的干预,直至1833年,俄国外交部亚洲司给第11届布道团团长的信中强调:“在同中国的关系上,俄国外交部主要的和一贯的目的就是政治和商业。”<sup>[7](P76)</sup>政府的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布道团的传教活动。

东正教其他特点也影响着它的传教活动。基督教会东西两派分裂后,东方教会自称正教,即基督教之正宗。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福音,扩大教徒,天主教和新教在宗教礼仪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易于非基督徒皈依基督教的改革。而东正教,较之于天主教和新教,更多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它坚持教义上的正统性,重视精神生活。在宗教传播方面,东正教徒不为传教而传教,他们坚持“东正教不是依靠人的直接努力来使人服从,而是以教会中的圣灵劝导

① 他们并且撰写了护教文献:如徐光启的《辟妄》,杨廷筠的《天释明辨》,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韩林、张庚的《圣教信证》等。

人”。<sup>[8](P233)</sup>因此，“东正教不强行说服人，不引诱人”，它“首先培育心灵”，这是它的主要特点。<sup>[8](P194)</sup>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中，他们许诺皈依基督教的人每人2000元，并且认为，一旦堤坝筑好了，就可以开始进行正确的灌溉。基于东正教本身的特点，东正教徒反对这种做法，因此，驻日圣者尼古拉(1861—1905)说，10分钱我也不给，因为宗教是心灵的信仰，信教不是为了金钱。<sup>[9](P222)</sup>驻华东正教徒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正教信仰密切相关，对于他们来说，与其发展更多并不虔信东正教的信徒，还不如保持现有东正教徒真实的信仰更为重要。伊萨亚申甫是第14届布道团修士司祭，他对于已经汉化的阿尔巴津人在东正教方面的态度也有着和尼古拉一样的哀叹，为他们的物质主义和不虔诚感到愤慨。<sup>[10](P408)</sup>

### 五、相去甚远的结果

传教士们在传教方式与活动范围方面的不同自然导致传教结果的迥异，这应该首先从当时及后来华籍教徒的数量方面看每一种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自康熙年间产生礼仪之争，雍正年间严厉禁教，至乾隆廿二年(1757年)开始实行闭关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清政府一直实行禁教政策。1773年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就此中止了耶稣会在华传教近200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清钦天监一直引用西方传教士，所以使得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并未绝迹；而且，耶稣会虽被解散，但其他天主修会仍继续存在，且改公开传教为秘密传教。

自1715年至1860年的将近150年间，除了阿尔巴津人的后裔之外，皈依东正教的华人微乎其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国公使进驻北京，俄传教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会议委派。从1860年到1917年，传教团共换班5次，在此期间才开始对传教投入力量。

传教士们第二个传教结果，也是最重要的结果便是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渠道，为中国的科技近代化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明末清初由欧洲传教士输入、传授天文学和数学等，修改了历法；后来还传来了西方的其他科技，如物理学、地理学、炮术、采矿术、医学、哲学等。明末传入中国的书籍即有7000—10000部，清初传教士还将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翻译编辑成《几何原本》等几十部满、汉文数学书籍。西方科技的传入对于在此方面已经落后

于西方的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同时，中国文化也通过他们的译介传到西方，至18世纪中叶，我国主要经典《诗经》、《书经》、《易经》、《道德经》等都先后被传教士们译成欧洲文字，使欧洲社会了解了中国，并在欧洲产生了中国热。

俄国传教士则不同，他们注重的是向政府介绍中国的各种情况，他们定期向政府呈报出使报告，此外便是进行个人的汉学、满学研究。200多年的俄国驻华东正教团培养了诸如伊拉里昂·罗索欣、亚金甫·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等众多杰出的汉学家，使俄国的汉学研究在世界汉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们的汉学研究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但是他们并没有向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文化和科技，虽然他们也向清政府进呈了300余种书籍<sup>[11]</sup>，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赠书只是历史实物而已，并未发挥其双方相互了解的作用。因此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可以说是相互的、双向的，而这种性质并不适于表述中俄关系。东正教团成员，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世俗人员，很多都成为成绩卓著的汉学家，他们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俄国社会。但是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则存在很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直延续至今。

(责任编辑：刘明)

### 参考文献：

- [1]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M].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8.
- [2] 布纳克夫.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上一页[J]. 苏联东方学, 1956(2).
- [3] 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外交政策(第二辑第二卷)[M]. 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76.
- [4] 利玛窦全集(第四册)[M]. 台北: 光启、辅仁联合发行, 1986.
- [5] (意)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6] 维谢罗夫斯基.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7] В. н. 彼得洛夫. 俄国布道团在中国[M]. 华盛顿, 1968.
- [8] С. Н. 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中译本)[M]. 商务印书馆, 2001.
- [9] 驻日圣者尼古拉笔记(俄)[M]. 日本, 北海道大学出版社, 1994.
- [10] И. Я. 科罗斯托维茨. 中国人及其文明[M]. 圣彼得堡, 1986.
- [11] 朔方备乘(卷三十九)[Z].

##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n and Other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 Wei-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and the western Catholic Missions all stay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y all belonged to Christianity and did missionary work, their missionary results were different.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ir missionary aims, missionary ways and missionary ranges were different.

**Key words:**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Catholic; missionary; Early Qing Dynasty

#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作者: [李伟丽, LI Wei-li](#)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刊名: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21(1)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1条)

1.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 1978
2. [布纳克夫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上的一页](#) 1956(02)
3. [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国外交政策](#) 1976
4. [利玛窦全集\(第四册\)](#) 1986
5. [柯毅霖 晚明基督论](#) 1999
6. [维谢罗夫斯基 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 1978
7. [B П 彼得洛夫 俄国布道团在中国](#) 1968
8. [С Н 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中译本\)](#) 2001
9. [驻日圣者尼古拉笔记\(俄\)](#) 1994
10. [И · Я · 科罗斯托维茨 中国人及其文明](#) 1986
11. [朔方备乘·卷三十九](#)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slstdxyxb-skb200501001.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slstdxyxb-skb20050100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3b09e7e9-9ecb-4974-a5a1-9e4d0083341e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